

元史 研究 新论

陈高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元史 研究新论

陈高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史研究新论 / 陈高华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695-X

I. 元... II. 陈... III. 中国—古代史—元代—文集 IV. 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59531号

元史研究新论

著 者: 陈高华

特约编辑: 徐文堪

责任编辑: 载 之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021-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开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1-695-X/K · 16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代序)

20 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下面,我们对前后两个阶段的元史研究,作简单的回顾,并对今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

20 世纪上半期(1949 年以前),中国的元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继续按传统的纪传体形式重修元史。明初修纂的《元史》,历来为学者所不满,一直有重修元史的呼声。清代杰出学者钱大昕有志于此,但只完成了《氏族表》和《艺文志》。重修成书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和魏源的《元史新编》。此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介绍了域外的有关史料,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进入 20 世纪以后,相继出现的纪传体重修元史著作有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绍忞的《新元史》。

《元书》刊行于清宣统三年(1911 年)。作者曾廉,湖南邵阳人,在戊戌变法时曾上书要求“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元书》是他丢官失意时所作,以《元史新编》为蓝本,主要讲究所谓“春秋之义”(《元书》自序)。此书在史料汇集和史实考订方面都未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可以说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蒙兀儿史记》初刻于 20 世纪初,后多次增刻。

作者屠寄,江苏武进人,清末进士。他生平致力于元史的研究,曾到过东北、内蒙等地考察。除了广泛搜集汉文文献证以实地调查之外,还让儿子学习外文,翻译有关资料。《蒙兀儿史记》一书,采用纪传体,“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文之总成绩(三)》)他的许多考订,是很有价值的。但屠氏利用域外史料有很大局限,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大工程,总不免顾此失彼,错误之处亦复不少。《新元史》初刻于1922年,庚午(民国十九年,1930年)作者自订最后定本,作者柯劭忞,清末进士,历任要职,民国后以遗老自居,从事著述。《新元史》出版后,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柯同年进士)下命列于正史,这便是“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一名的由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予作者文学博士学位,因而更为人们所瞩目。这部著作搜罗资料丰富,有不少可供参证的地方。有些《志》的调整改写(如《刑法志》、《礼志》等),以及新增若干列传,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但是,此书“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同前)这种做法,不仅给学者带来很大不便,也必然降低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柯氏亦注意域外史料的利用,但他和屠寄一样,只能依靠他人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以帝王将相为本位的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局限,转而采用西方史学的写作形式。在这样一个大转变浪潮中,屠、柯二氏仍坚持采用纪传体史书体裁,明显落后于时代,实际上也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他们以后,再没有人从事重修《元史》的工作。

一种是实证史学的研究。林甘泉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二

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我很同意他的意见。实证史学的几位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曾涉足于元史研究。王国维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以及一些论文,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考》等,博大精深,至今仍是元史学者的必读著作。陈寅恪的《元代汉人译名考》,是应用对音勘同方法的一篇作品,具有开创的意义。以上三位可以说是以实证方法研究元史的第一代学者。继他们而起的是翁独健(1906~1986 年)、韩儒林(1908~1983 年)、邵循正(1909~1972 年)诸先生。他们都曾到西方求学,熟悉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因而善于将汉文文献和其他文字(蒙文、波斯文等)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在研究工作中有不少新的突破,为中国的元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翁独健关于斡脱和《元典章》职官译语的研究,韩儒林关于成吉思汗十三翼、答剌罕等研究,邵循正关于波斯刺失德丁《史集》的研究,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从事元史研究的还有姚从吾、冯承钧、吴晗、唐长孺等,都有可观的成绩。

还有一种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元史研究。蒙思明先生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完成于 20 世纪的 30 年代。蒙先生在书中指出,元代社会是“贫富悬隔”的阶级社会,元末革命即由此而起。他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吕振羽等,在他们撰写的通史著作中,对元代社会也有所论述。

总的说来,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元史研究只能说属于开创时期,研究者为数有限,成果也不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国外的同类研究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上述前辈们的工作,筚路蓝缕,无疑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儒林先生说:“解放后,我自感宛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切新鲜,一切令人鼓舞。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不仅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穹庐集自序》)韩先生的话,反映了研究者的共同心声。但是,接连的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倾思想,严重挫伤了研究者的工作积极性。“四人帮”灭亡以后,“左”倾思想的批判,改革开放的实施,带来了史学园地的春天,元史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大体说来,20世纪下半期的元史研究,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6年,元史研究的队伍很小,加上“左”倾思想的干扰,成绩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元史研究处于停顿状态。例外的两项工作是《元史》的点校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元代部分的编绘。元史研究者在艰苦环境中完成的这两项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后,元史研究面目一新,研究队伍扩大,研究成果丰富。由于语言文字以及其他原因,元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被视为冷僻的学问,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变。

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元史研究的进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五六十年代,研究集中于早期蒙古社会性质、农民战争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几个方面。和本世纪上半期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具有新意,是研究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70年代后半期起,研究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解放了思想,同时也从外国的史学理论和研究

方法中得到启发,从而扩大了视野,开拓了研究领域。从横的方面来说,广泛涉及政治(事件、制度、人物等),经济(人口、农业、手工业、赋役、商业等),文化(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以及民族、中外关系等许多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过去研究重视两头,即蒙古国和元末农民战争时期,对于中间的历史特别是 13 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很少有人注意。近年的研究重点明显地转移到忽必烈时期和 13 世纪上半期。与之相应,是研究角度的变化。在元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倾向是,研究者特别重视元朝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蒙古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例如官制中的蒙古职官名称,兵制中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等,而对汉族文化成分往往有所忽略。近年来,研究者更多地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努力分析各种文化成分的主次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撞击、相互影响以至融合。

根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下半期发表的元史研究论文在 1500 篇以上,各种类型的著作(断代史、专题研究、集刊、资料、工具书等)在百种以上。其中元史研究会的会刊《元史论丛》,已出七辑,李治安的《元朝分封制度研究》(1992 年)、刘迎胜的《西北民族史和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994 年)、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 年)、罗贤佑的《元代民族史》(1996 年)、张帆的《元代宰相制度研究》(1997 年)等,都是精心构思、获得好评的研究著作。这些作者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走上研究工作岗位的,他们的成绩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元史研究的希望。杨志玖的《元史三论》(1985 年)、陈高华的《元史研究论稿》(1991 年)、邱树森的《贺兰集》(1997 年)等,则是这些作者多年从事元史研究的作品汇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20 世纪下半期中国大陆元史研究的发展过程。

随着元史研究的进展,陆续出现了一些综述元代历史的作品,较早有《中国通史》第七册(执笔人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中国史稿》第五册(执笔人陈高华),前者较详,后者简略。1986 年出版了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全书 70 余万字,充分吸收了已有的

研究成果,对元代历史作了全面的叙述,并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0年代,又出版了由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篇幅比《元朝史》更大,体例有所不同,论述更加详赡。另一种《元代史》(1993年)是由周良霄、顾菊英完成的,在不少问题上有作者自己的见解。

二是资料整理工作和工具书编纂取得可喜的成绩。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编纂,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翁独健、韩儒林两位先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曾多次提出建议,并且亲自主持、组织这两方面的工作。在前辈学者的启迪、鞭策下,元代史料的整理(包括史籍、文集的点校笺证,蒙、藏史籍的汉译,专题史料的辑录等)和元史工具书(辞书、索引、地图等),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在史料整理方面,首先应提到的是《元史》的点校。这一工作在翁独健先生主持下进行,经过五年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出版于1975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校勘的《蒙古秘史》在1981年出版,校勘本改正了以往各本中的多处错讹,对《蒙古秘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元代官修地理书《大元一统志》和民间修撰的大都(今北京)地方志《析津志》均已散佚,先后有辑佚本出版,使读者得以窥见原书部分面貌。方龄贵经过长期努力完成的《通制条格校注》,已于2001年出版。黄时鉴主持的《元代史料丛刊》已出五种(《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吏学指南(外三种)》、《通制条格》、《庙学典礼(外二种)》、《秘书监志》)。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苏天爵的《滋溪文稿》、揭傒斯的诗文集、汪元量的《湖山类稿》等,先后整理出版。两种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中外关系方面的文献(《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西游录》、《异域志》)和记述顺帝一朝历史的《庚申外史》,都有整理本(校注、校释)出版。

在史料的专题辑录方面,有杨讷、陈高华等合编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5年),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1989

年),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1980年),宗典的《柯九思史料》(1963,1985年第2版),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1984年)等。前述《元代法律资料辑存》,亦是一种史料的专题辑录,系黄时鉴辑点。把分散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加以考证辨析,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编有《元代白话碑》一书,可谓这方面的开创之作。50年代,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把这方面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八思巴字是元代创制的一种文字,罗常培和蔡美彪合作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既有关于八思巴字的系统论述,又汇集了有关的多种资料。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1991年)既包括作者的研究论文,又是多种文献的汇集。

民族史籍的整理和译成汉文,是元代文献整理的一大特色。《蒙古秘书》是蒙古早期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只有汉字标音本传世,恢复《秘史》的本来面目,是各国蒙古学家追求的目标。亦邻真完成了《秘史》的畏兀儿字复原本(1987年)。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号称蒙文三大历史文献之一的《蒙古黄金史纲》,由朱风、贾敬颜译成汉文出版(1985年)。先后译成汉文的藏文史籍有《汉藏史集》、《红史》、《郎氏家族史》等,其中颇有汉文史籍未载的史实,对于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工具书的出版,辞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的“元史”分册(韩儒林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分册(蔡美彪主编)。历史地图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元明时期”(谭其骧主编);索引有方龄贵的《元朝秘史通检》(1986年),陆峻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79年),姚景安的《元史人名索引》(1982年)。周清澍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1983年)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一部书。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学者对于“域外史料”心向往之,作过许多努力。但苦于条件限制,只有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域外史料”的汉文译本才得以陆续和中国学者见面。其中有何高

济译的《世界征服者史》(1981年版),余大钧、周建奇译的拉施特《史集》(1983~1986年)。13世纪上半期欧洲教会使节的行记,有两种译本。何高济还翻译了《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1981年)。马可波罗行记和伊本·巴图泰游记,亦有新的译本。

三是考古文物工作亦有一定的进展。大都(今北京)、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都进行过考古调查,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近年在上都遗址及其周围进行发掘和调查,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在内蒙古,发现了不少元代古城遗址,如应昌路故城、集宁路故城等。元代墓葬亦有不少发现,比较著名的有贺氏家族墓、汪氏家族墓等,近年真定史氏的墓葬亦有发现。泉州发现了大量伊斯兰教、基督教信徒的石刻,是研究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还有不少印度教文物,亦应是宋、元时期的遗迹。陈达生主撰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1984年)一书,汇集了大量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主要属于元代。扬州等处亦有元代伊斯兰石刻发现。内蒙额济纳旗黑城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外国探险家曾进行盗掘,运走大量文书和其他文物。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当地进行多次调查,1983至1984年两次发掘,收获颇丰,已出版《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1991年)。这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成果。

20世纪下半期,我国台湾地区的元史研究亦有很好的成绩,已有其他先生介绍,这里不再述及。

三

上面我们简单回顾了本世纪以来元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大陆的元史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一批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较好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研究的主力。为了促进元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进一步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目前元代文献资料的情

况,大体上还是清楚的,但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整理,二是发掘。整理工作是多方面的,总的目的是使文献资料便于利用。由北师大古籍所主持的《全元文》编纂工作已告一段落,陆续问世。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工程。在《全元文》的基础上,我们应深化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元代很多重要人物的文集,都应该很好地整理,包括校勘、辑佚等等。对于地方志、金石志中的元代文献,更应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全面、系统地加以辑录。以方志来说,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编纂的方志,其收录的文献往往不同,我们不能以查阅过其中一种便感到满足。对于一些元代的基本文献,也有必要认真加以整理,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正在进行《元史》的校注工作。《元典章》的点校,也应该早日进行,在这方面日本学术界做了很多工作,走在前面,我们应加快步伐。所谓“发掘”,就是寻找前人未知的各种文献资料,在这方面也是有事可做的。最近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997年)使我们了解,当年俄国人从黑城掠走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元代文书,这是以前不为人所知的。而近年为人们瞩目的徽州文书中,属于元代的亦有一定数量。至于分散在各地的元代碑刻,未见辑录者,为数尚多。如此等等。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整理发掘工作做好了,研究就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且往往会开辟出新的天地。

二是做好考古工作。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如元朝统治时间较短,皇帝葬在漠北,蒙古人一般无墓室等),元代考古,比起以前的朝代来,要薄弱得多,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工作可做。近年上都的考古,便有较好的收获,可以相信,还会有所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确定了元中都的遗址(在河北张北境内),地面上有不少另散的文物。1999年进行的初步发掘工作,已有不少可喜的发现。辽宁绥中海域的沉船,被确定是元代遗物,沉船载有瓷器和铁铧犁等物,出水的磁州窑龙凤罐,属于珍品。宋元最后一战发生在广东崖门海域 即今新会的银洲湖地区。经初步

调查,银洲湖水下及周围陆地确有此次大战遗物的存在。举出以上几个近年的例子,足以说明元代考古还是很有希望的。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这是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元史研究亦不例外。考古发现不仅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而且可以提出新问题。衷心希望今后元代考古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三是不断深化专题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应该看到,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的领域研究成果较多,如政治史、经济史;有些领域则很薄弱,甚至刚处于起步状态。即使是成果较多的领域,也是不平衡的,例如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关于地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就很薄弱;又如在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区域经济和财政制度的研究,也是很不够的。元代法制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为数可观的研究作品中,人云亦云、粗制滥造之作亦复不少。

目前我们已有几种获得好评的断代史。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专题研究上,在元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领域,选择一些重要课题,认真探索,写出一批高水平的论文和著作来。目前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断代专门史,如《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代民族史》、《元代政治制度史》等。希望有更多的专门史问世,作为断代史的补充,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化。

客观世界的变化,研究工作的深入,都会导致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史学发展的动向,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例如,卫生医药史的研究,现在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个时代的卫生医药,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哲学、社会生活、中外关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卫生医药状况,内容丰富多采,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青睐。又如,现实生活中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人们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日益关注。元代是一个多灾害的时代,各种自然灾害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对元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还只能说刚

刚开始,有待深化。社会历史是个整体,研究工作互相关联。只有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原有领域的研究才会深化。可以预期,在新的世纪,元史研究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原载《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目 录

20 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代序)	1
元代土地典卖的过程和文契	1
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26
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 ——读《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	49
元代的酒醋课	65
元代商税初探	82
元代的流民问题	98
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	121
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	171
论窦默	184
赵孟頫的仕途生涯	203
王楙使宋事实考略	220
元代的航海世家澈浦杨氏 ——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	238
元代诗人迺贤生平事迹考	262
元代的哈刺鲁人	288
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	304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337
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360
元代的地方官学·····	376
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	421
《元史》纂修考·····	437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	458
后 记·····	463

元代土地典卖的过程和文契

元代民间私有的土地,可以买卖,也可以质典(抵押)。前者是土地所有权的永久转移,后者则可以说是土地所有权的暂时或部分的转移。由于两者都标志着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因而在政策法规中常常相提并论,作为同一类问题来处理。

元代土地买卖和质典都是常见的和频繁发生的经济现象。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如“千年田换八百主”^①，“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②,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情况。与此相应,元朝政府颁布了若干政策法规,从各个环节加强对土地买卖和质典的管理。本文所要讨论的元代土地典卖的过程和文契问题,实际上就是元朝政府对土地典卖如何管理的问题。

—

现在可以查考的元朝政府有关土地典卖的法令,以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发布的为最早。后来陆续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先将至元六年的法令征引如下:

① 胡祜适:《折狱杂条》,《紫山大全集》卷23。按,南宋辛弃疾词《最高楼(吾衰矣)》(《稼轩词编年笺注》卷3)中已有此语,其流行当更早。

② 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事林广记》(日本翻刻泰定本)庚集。按,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富家置产多存仁心》中已有此语。